

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

万 建 中

礼，是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。在我国这个极重礼仪的国度，最重要的要算是饮食之礼了，这是因为最早的礼仪是由饮食活动中产生的。如《礼记·礼运》所言：“夫礼之初，始谐饮食，其腊黍菹豚，汎尊而抔饮，蕡桴而上鼓，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。”这是说最原始的礼仪，是从饮食行为开始有。《周易·序卦传》也说过：“物畜然后有礼”。可见，原始的礼仪，是在人们的食物质丰富以后，再从人们的饮食习惯开始的。

从“礼”之本义亦可证实这一点。“礼”（禮）字同“醴”本为一字，同从“豎”，象两玉盛在器内之形。古人在饮食中讲究敬献的仪式。敬献用的高贵食品便为“醴”。后来才进而把所有各种尊敬神和人的仪式都一概称之为“禮”。再后推而广之，把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传统习惯和需要遵守的规范，都称之为“禮”。这就是王国维在《观堂集林·释礼》中讲的：“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曲若，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，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，通谓之礼。”又如古代的“鄉”字。本来“鄉”同“饗”，甲骨文和金文中只有“乡”，其含义为乡人共食。后来才把在一块共食的人群称作“鄉”，亦即推演为鄉党、鄉里的“鄉”。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，《周礼》中的“鄉饮酒礼”“公食大夫礼”“鄉礼”“燕礼”等，都是从原始社会的聚餐饮食活动中演化生成出来的。当然，这些礼仪的正式提出，并作为礼仪制度确立下来，始于周公。据说，这是周公看到殷人宴饮无时，挥霍无度，“胜而无耻”的弊病，想加以节制而制订的。后来的各个朝代对其绝大部分都沿袭下来，被取消的不多，可见周公饮宴礼仪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。

人们饮食的行为习惯产生了礼仪，饮食自然也就成了礼所约束最严的活动之一。其实，先秦时期礼仪大致框定在饮食活动的范围内，归纳起来，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。

• 66 •

其一是以主食的种类和佐餐副食的多寡有无，区别人们等级的尊卑长幼。在饭的种类上，王公贵族讲究“牛宜稌、羊宜黍、豕宜稷、犬宜粱、雁宜麦、鱼宜菰，凡君子之食恒放焉”，①这是礼所认为最适宜的饭菜搭配法，也是君王和贵族大夫用膳的共同准则。而贫民的日常饭食，则是以豆饭藿羹为主，豆类在古代是求荒济贫的粗粮，正如《战国策·韩策》云：“民之所食，大抵豆饭藿羹，一岁不收，民不厌糟糠”。可见，两个阶级在饮食上的分野是很明显的。

在菜肴的食用上，这种等级区别更为显著。近年来，考古工作者用碳十三来测定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骨骼，发现不同阶层的人由于饮食不同，骨骼中的成分就不同，证明了贵族菜肴是以肉类为主，平民菜肴则以蔬菜为主，不同阶层的食谱分划极为明显。②这与文献的记载相符。《仪礼·公食大夫礼》说周天子便宴是“六食六饮膳，百馐百酱八珍之齐”；上大夫请客是“八豆八簋六刑九俎”，外加雉、兔、鹑、鷄四味，数目都十分可观。《礼记·礼器》云：“礼有以多为贵者，天子之豆三十有六，诸公十有六，诸侯十有二，上大夫八，下大夫六。”我们再比较一下平民的饮食之礼，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言：“乡饮酒之礼，六十者三豆，七十者四豆，八十者五豆，九十者六豆，所以明养老也。”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，在这种宴会上，最为恭敬的长者，也只能享受六盘菜的礼，只相当于一个下大夫平日的生活水平，而且平民所享受的这种礼，也只是一种表面文章。

其二是主张重味少吃。饱食是庸人所为，贪食更是一种恶行。相反，“少吃多滋味”。郑玄说《周礼·膳夫》的“羞”之中，有“庶羞”，其作用就是滋味（“出于牲及禽兽以备滋味谓之庶羞”）；甚至主食也不能多吃贪食，《礼记·曲礼上》就把“毋放饭”和“毋持饭”作为饮食的礼仪要求。先秦主食进食不用箸、匕而用手。“抟”即用手抓饭时，大把抓后攥紧，这样得饭必

多，这是为争饱而不谦恭了。所谓“毋放饭”，意为不要大口地吃饭。黄以周《礼书通故·食礼二》有详释：“古者饭以手，凡礼食有饭数，一手谓之一饭，一饭三咽。……《礼器》云‘天子壹食，诸侯再，大夫、士三’，此明一饭之食数有三种。《少仪》记饭法曰：‘小饭而亟之，数噍’。是一饭不可大作一口也。大作一口是放饭矣。”

这种礼仪是以“节”的手段体现出来的。在先秦，节酒是十分重要的，谓之“酒礼”。在朝廷宴席上专设有监督礼仪的职官。《诗经·小雅·宾之初宴》中描述道：当与宴者未醉时，仪表庄重，举止得当。而一旦喝醉，则轻举妄动，举止失措，失去礼貌。最后写道：“凡此饮酒，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监，或佐之史。彼醉不臧，不醉反耻。……三爵不识，矧敢多又。”就是说宴席上有监察礼仪的职官和史官，与宴者有的适可而止，有的却喝多了。醉了的本来不好，但反以不醉的为耻。他们对君臣小宴以三杯为限礼制都不懂，况且敢于多次劝他们饮酒。再以君对臣的燕礼为例。设在堂上东边柱子西侧两樽方壶，堂下门西侧两樽圜壶，饮酒时用音乐助酒，宾主敬酒与回敬许多回合。但被宴的臣子回去时，必定要退下台阶下拜。当奏乐的人为他敲钟送行时，还要把带来的肉脯赐给敲之人，以此表示自己饮酒是适量的。节食节饮与礼是不可分割的。先秦的宫廷和士大夫是靠“节”来维持礼的，所谓“情有节”“节嗜欲”（《吕氏春秋》）都是礼的一部分。

其三是重陈馔之器。作为中国青铜时代象征的“彝器”，主要是饮食器。有人称中国古文明为“鼎鬲文化”，用古人使用的烹饪器鼎和鬲作为中国的文化特征。陶质的鼎和鬲都是仅仅出现在古代中国的三足烹饪器，在距今七八千年前，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裴李岗文化的红陶中，已有三足的鼎及鉶了。后来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，山东的大汶口文化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、马家浜文化中，都出现过不同式样而有三足的鼎、鬲、鬻、盉、甗。在中原地区进入夏、商之后，又新增了爵、斝和三足盘。所有这些三足的炊具和餐具，都曾被广泛地使用。这些器具一出现，便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。“鼎俎奇而笾豆偶，阴阳之义也。”“郊之祭也，……器用陶瓠，以象天地之性也。”③食器被赋予了阴阳两气的文化观念，不可随意用来盛食和烹食。同样体现出森严的等级性及礼仪规范。在陶制的三足器外，上层贵族更用青铜制造

同类器皿，于是原来用于烹饪和祭飨的鼎成了贵族们的专用品，以至成为王权的象征。传说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，用铜铸九鼎，峙立于他的居地，用来象征他统治了天下九州。这九个鼎世代相传，成为国家统一的标志，民族昌盛的碑记，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前，才在战乱中被丢失了。

先秦时代还重视置器的数目。商代以饮酒的爵的一定数级象征社会等级的高低。周代以用鼎制度体现从天子到士的五等爵制。据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等书所载“天子九鼎，诸侯七，卿大夫五，士三。”在统治阶级内部，由于阶层、身份的不同，筵席间的设鼎的数量以及里面盛放的食品都有严格的区别。违犯规定就视为越规。“礼不下庶人”，因而劳动人民只能望鼎兴叹。至春秋战国时代，一般百姓也仿制礼器，追效贵族的时尚。

“三礼”（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）皆以为使用食器要符合礼仪的要求。《周礼》记载，在食官之长“膳夫”领导下，掌四簋之实的“笾人”，掌四豆之实的“醢人”，甚至掌共巾幕（以巾覆饮食之物，起某些有盖餐具之盖的作用）的“幕人”，都是食器的掌管者，各司其职，十分严密。宫廷里还有造的“陶人”，造簋的“簠人”，制饮器的“梓人”等，从事餐具饮器的生产，式样、规格均有一定的法式。无论是祭祀、燕享、饌肴的数量、还是餐具饮器的配置，有一整套制度。《仪礼》所载的十六种“礼”，到了十分繁琐的程度。其中，什么场合上几豆几簋，放左或放右，簋、簠、铏、俎谁先谁后，都有章法，可谓笾豆有践，尊俎有序。《礼记》在这方面的礼仪记载更多。《曲礼》言：“凡进食之礼，左肴右筭，食居人之左，羹居人之右……。”凡是陈设餐食，带骨的菜肴须放在左边，切的纯肉放在右边。饮食靠着人的左手方，羹汤放在右手方。细切和烧烤的肉类放远点，醋和酱类放在近处。葱等拌料放在旁边。酒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。如果另要陈设干肉、牛脯等物，则弯曲的在左，直的在右。这套程序在《少仪》中更有详细的记载，如上鱼肴时，如果是烧鱼，以鱼尾向着宾客；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；夏天鱼脊向宾客的右方。可见食器摆放方面的礼仪是颇多的。

其四是重食者席位。初民时代，围火而食，那时唯一可以判断食者尊卑长幼的次序的是食者的座席。约在中原的商代中期，中国的民居开始出现了厨房，火灶从主室移出。但是，围火而食产生的伦理意味的座席之位却形成礼仪制度之一。历代酒宴的座次排列，一直与官秩、名位、爵衔相通，昭穆有序，

丝毫不得紊乱，否则，则有“僭越”之嫌，视为大逆不道。

据古文献记载，先秦时代人们参加酒宴是席地而坐饮酒的，“筵”和“席”都是铺在地上的坐具。“筵”是用蒲草或苇子等粗材料编织成的坐具，“席”是用葍草等细材料编织成的坐具，面积要小一些。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说：“筵长席短，筵铺陈于下，席在上，为人所坐策。”可见，古人把筵先铺在地上，再根据人们不同的身份加席。西周时筵席制度是很严格的，如果越礼而加席是有罪的。《礼记·礼器》这样规定：“天子席五重，诸侯之席三重，大夫再重（即在筵上加两层席子）。”至于士及平民，在筵上加一层席子就很不错了。

由于当时饮酒进食是在筵席上进行的。故“筵席”二字就具有了酒馔的含义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铺筵席、陈尊俎、列笾豆，以升降为礼者，礼之末节也。”正是把筵席、盛器、食物及礼仪结合起来宴饮的写照。“筵席”由此而得名。可见筵席之制本身就是礼仪的范畴。到了战国时期，一般人家的家庭仍是席地而坐，酒和馔直接放在上面；而较富有者或有身份者，则采用在筵席加一种矮腿案子来摆放酒馔。最早的食案见于龙山文化。在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一些墓葬中，死者棺前就摆有低矮的木案，案上放有杯、觚、

等酒具多件。这种方式比起在筵席上饮酒要方便和卫生多了，但只有年岁大的家长才有资格使用，家庭一般男性成员是不能加案子的。饮宴时，家庭里的妇女不能入座，其任务是把盏斟酒和献食。这一礼仪直到今天，仍在一些乡村的家庭上可以见到。

其五是讲究用饭过程中，尊卑先后有序。《礼记·少仪》云：“燕侍食于君子，则先饭而后已。”与尊长一起吃便饭时，先奉尊长食，同时要等尊长吃完了才停止。与国君进食，更要注意揖让周旋之礼，这就是：“若赐之食而君客之，则命之祭，然后祭；先饭辨尝羞，饮而俟。若有尝羞者，则俟君之食，然后食，饭饮而俟。君命之羞，羞近者，命之品尝之，然后唯所欲。”④这说明与国君一同进食，有一定的程序。通常按供食的礼仪，都由主人先祭，客人后祭，如果君赐臣食，臣可以不祭。君以客礼待臣，臣就要祭了，但也得先奉君命，然后才敢祭，上菜以后，侍食的臣子，要代膳宰遍尝各味，然后停下来喝饮料，等国君先开始，才能吃。要是有膳宰代尝饮食，就不必品尝了，等国君开始吃就可以吃，但是吃饭也得啜饮以等候国君。国君请用菜的时候，要先吃近处的菜，请品尝菜

肴的时候，就得一一尝一点，然后才依自己的爱好来选食。如果“君未作覆手，不敢餐。君既食，又饭餐者，三饭也。君既撤，执饭与酱，乃出授从者。凡侑食，不尽食，食于人不饱。”⑤国君还没有吃饱，侍食的臣子不敢先饱。国君吃饱了以后，臣下还要对国君劝食，但也只以三次为度。国君吃完离席之后，就把吃剩的饭酱，拿出来分给随从的人吃，凡是陪侍尊者进食，都不得放肆，不得饱食。

先秦饮食方面的繁琐礼仪的宗旨，是培养人们“尊让谦敬”的精神。⑥它要求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得遵照礼的规定秩序去从事饮食活动，以保证上下有礼，从而达到“贵贱不相逾”的生活方式。⑦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礼仪的范围更加广泛，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但是，人们仍主要通过饮食活动来履行礼仪，区别尊卑。这样，饮食也就成为礼最外在的表现形式。

在我国所有礼仪中，最为神圣、肃穆并为全国上下普遍恪守的为祭祀之礼。古代的“祭”字，是手持肉供于神祇的象形。殷、周时，人们崇鬼神好祭祀，所以甲骨文中有许多的祭典名称，诸如衣祭、翌祭、侑祭、御祭等等。对当时的天和上帝，祖先神以及自然的崇拜，是通过符合人伦目的的祭祀来实现的。人们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构想诸神的灵界生活，因而祭祀就是让神吃喝。宗庙的神祇也依人间的座席摆定座次，然后供奉以诸神饮食之物。食物的种类按神祇地位高低而有所不同。先秦最隆重的祭祀食品是牛、羊、猪三牲组成的“大牢”，其次是羊、猪组成的“少牢”，这是祭天神和祖宗用的。如果单祭田神，祈求丰收，一只猪蹄便可以了；如果单祭战神，确保胜利，一只狗也就行了。

《孝经》云：“礼，敬而已矣。”其中心是孝悌。孝悌被简称为“养”，《荀子·礼论》篇说“礼者，养也。刍豢稻梁，五味调香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苾，所以养鼻也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篇论及孝的三级标准时说“其下能养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养，从食，羊声”，养老与食有着紧密的联系。《礼记·内则》篇云：“子事父母，枣栗饴蜜以甘之。”养老必以食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“养”之为“羊声”，“羊”字作为表现美食的基本字素，除“美”“鲜”等明显者外，“烹”“酿”等的古字皆含有之，而羊本身就为美食之一，它的以食来养老的意义显而易见。古代的羊与酒皆成为慰劳老人的赠品，如唐宪宗元和元年诏赐天下百姓高年者以“羊酒”，谓之“羊酒存问”。羊字音义皆与养老有关。（下转第101页）

的，他为抗日奔走呼号，为抗日尽了最大努力，作出了榜样，这是李烈钧爱国主义思想最典型、最生动的事例。

总之，李烈钧先生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在战争时期，不论是执政还是退职时，不论在祖国还是在他乡，都不忘教育，并为此付出大部分精力。所以，可以说李烈钧是一位教育家，他在培育人才这方面的贡献，是无法估量的。

教育思想的影响

李先生的教育思想，是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、三民主义性质的思想，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：它鼓吹了革命，培育了革命骨干，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；它激发了人们反帝爱国热情，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，李烈钧冒着生命危险，严厉谴责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，号召抗日，又送5子上前线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；它主张弘扬民族文化，同时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，为我所用，打开了民族的眼界。这些思想，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
当然，李烈钧的教育思想也有其局限性，主要是教育对象的不普遍性，对革命、爱国、师夷长技的教育，只限于学生、士兵、少数知识分子，对广大的人民

群众，则没有发动，二次革命，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士兵革命，所以，一旦兵败，就如山倒，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使然。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革命，是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和实现的，我们不能苛求前人。

不过我们应该看到，李烈钧重视教育的认识，他的教育思想、教育实践、教育方法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将来，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(责任编辑 王能昌)

注：

- ①②③④⑤⑨⑪⑫⑯⑰《李烈钧文集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第583、579、583、219、249、259、47、73~74、579、579页。
⑥《李烈钧将军自传》，三户图书社1988年版，第28~29页。
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⑳⑳《李烈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》，台湾“中华民国”史料研究中心发行，第6、5、4、305、19、6、6、194、2、305、2、6页。
⑬《江西民报》1912年（月日已看不清楚）。
⑭《李烈钧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第168~169页。

（上接第68页）无怪乎孟子讲孝道，一个理想就是要让70岁的人能吃上肉。

先秦时，饮酒与孝悌关系甚为密切。《诗经》中诸多有关诗句，可以举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为代表，说明酒是为奉献给作为族长的老者而酿造的。《易经》“饮酒濡道”的注疏说：“先王作醴，所以奉明祀、养高年而已。”《汉书》也说：“酒者天下之美器，帝王所以颐养天下，享祀祈福，扶衰养病，百福之会。”可见理论上酒专用于养老和祭祀。

先秦的礼仪文化，无一不与饮食有关，其中大多是饮食民俗的直接延伸和发展。礼仪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的。《管子》中有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可见知礼节或礼节较多的民族，都是经济较为发达，特别是饮食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。

中国饮食文化著称为世，所以中国就能够成为礼仪之邦。同时，先秦已初具规模的礼仪文化的世代延续、完善，又大大地强化了“民以食为天”的传统观念，使得我国“食物本位观”一直未受到撼动。

(责任编辑 吴直雄)

注：

- ①《周礼·天官·食医》。
②参阅蔡蓬珍《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》，《考古》1984年第10期。
③《礼记·郊特牲》。
④⑤《礼记·玉藻》。
⑥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。
⑦《韩非子·有度》。